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

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

1994 3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季刊
(Quarter)

1994年第3期
(总第13期)

主 编 邢玉林
Chief Editor Xing Yulin
执行编辑 范秀传
Editor Fan Xiuchuan

目录英译 纳 日

封面题字 启 功
封面设计 冯光美

1994年7月出版

目 录

学者论坛

- 日商西泽吉次掠夺东沙群岛资源与中日交涉…… 吕一燃(1)
- 古长城的国防价值再评估 …………… 姚有志 毛振发(11)
- 清政府对蒙古、东北封禁政策的变化…………… 赵云田(20)
- 蒙古高原诸族政权及其递嬗
- 兼论中国北部边疆问题 …………… 孟古托力(28)
- 释“库克蒙古” …………… 阿尔丁夫(37)
- 1759年~1911年新疆的变乱…………… 潘志平(42)
- 20世纪前半叶苏联出兵新疆述论…………… 齐清顺(56)
- 清代打箭炉城的川藏贸易的产生和发展 ……… 吴吉远(67)
- 近代西藏林业史钩沉 …………… 房建昌(75)

探索与交流

- 唐贞观四年设置突厥羁縻府州考述 …………… 樊文礼(88)

学者介绍

- 学识渊博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刘节 …………… 易 林(95)

研究综述

- 1978年以来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述评(上)……………
- …………… 马大正(98)

文献之窗

- 《查漠史》简介…………… 陆水林(111)

Contents

Forum

Japanese Merchant Nishizawa Kichiji's Plunder of Resources in the Pratas

Archipelago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Lu Yiran(1)

Re-evaluation of Old Graet Wall in Terms of National Defence

..... Yao Youzhi Mao Zhenfa(11)

Changes in Qing Government Forbidden Policy towards Mongolia

and Northeast Zhao Yuntian(20)

Vassal Powers on Mongolian Plateau and their Successive Changes

— Also on china's Northem Frontier Problems Mongoltoli(28)

Explaining "Khokh Mongol" Ardinhuu(37)

Social upheavals of XinJiang in 1759~1911 Pan Zhipin(42)

Commentary Introduction to Sending Troops by the Soviet to Xinjiang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Qi Qingshun(56)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e between Si Chuan and Tibet in the City

of Da Jian Lu in Qing Dynasty Wu Zhiyuan(67)

Tracing back to Modem History of Tibetan Forestry Fang Jianchang(75)

Exploration and Exchange

Textural Research on Establishing Turkic Restraining *Fu* and *Zhou*

in the Fourth Year of *Zhen Guan* of Tang Dynasty Fan Wenli(88)

Who's Who in Academic Circles

Erudite and Fruitful Historian Liu Jie Yi Lin(95)

Summarised Research

Commentary Introduction to Study of Modem Borderland Problems

since 1978 Ma Dazheng(98)

Windows on Textual Sourc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Zha Mo Shi> Lu Shuulin(111)

日商西泽吉次掠夺东沙群岛资源与 中日交涉

吕一燃

东沙群岛,由东沙岛、东沙礁、北卫滩和南卫滩组成,分布于北纬 $20^{\circ}33' \sim 21^{\circ}58'$,东经 $115^{\circ}54' \sim 116^{\circ}57'$ 之间的海中,是南海四组群岛中最靠近大陆的一组岛礁。东沙岛面积约1.8平方公里,与西沙群岛中的永兴岛面积相仿,是南海诸岛中面积最大的两个岛屿之一。东沙群岛北距广东汕头约168海里,西北距香港约169海里,东北距台湾约240海里,东南距菲律宾马尼拉约430海里。

东沙岛古称“珊瑚洲”。晋朝裴渊的《广州记》记载说:“珊瑚州,在(东莞)县南五百里”^①。元代《岛夷志略》把东沙与西沙、南沙通称之为“万里石塘”^②。明宣德八年(1433年)以前问世的《郑和航海图》(原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山水直抵外国诸蕃图》)称东沙群岛为“万星石塘”^③。清代康熙年间的《指南正法》、雍正年间的《海国闻见录》、乾隆年间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等则称之为“南澳气”^④。闽粤渔民俗称之为“东沙”。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称该群岛为“东沙”的记载,恐怕是谢清高(1765年~1821年)口述,杨炳南(一说吴兰修)笔录的《海录》一书了。谢清高是航海家,1782年18岁时随外轮出洋航行,1795年返回。《海录》一书即记其航行见闻。该书记载说:“船由吕宋……若西北行五六日,经东沙,又日余,见担干山,又数十里入万山,到广州矣。东沙者,海中浮沙也,在万山东,故呼为东沙”^⑤。关于“东沙”名称的由来,这里说是因为该岛屿在万山之东而得名。另一种说法是,“该岛向名东沙与附近琼岛之西沙对举”而言^⑥。这两种说法都说得通。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一斑录》卷1《中国外夷总图》中就标有“东沙”、“西沙”和“石塘”。“东沙”指的就是东沙群岛,“西沙”指的就是西沙群岛,“石塘”指南沙群岛。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用“东沙”标记东沙群岛的地图。1881年7月王之春绘制的《沿海舆图》也标有“东沙”。因为东沙群岛“沙蹟围抱,作半月形”,所以当地渔民也有称东沙岛为“月牙岛”或“月塘岛”的。1866年,英国人蒲拉他士(Pratas)航行南中国海,遇风停泊于此,其后西方的图

①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6,岭南道一广州东莞县页12引裴渊《广州记》。

②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万里石塘条。

③ 向达校注:《郑和航海图》,页40~41;《地名索引》(中华书局,1961年),页15。

④ 吴凤斌:《南海诸岛中几个地名考释》,见吕一燃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页159~161。

⑤ 谢清高:《海录》,卷中,“小吕宋”。

⑥ 陈天锡:《东沙岛、西沙岛成案汇编》,《东沙岛成案汇编》(广东实业厅印,1928年),页25。

籍便称“东沙群岛”为 pratas Island^①,对此我国有“蒲拉他士岛”、“蒲拉打士岛”、“蒲勒他士岛”、“布拉达士岛”或“布拉他斯岛”、“碧列他岛”等多种译法。

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资源非常丰富,有鸟粪层、各种鱼类、胶菜、海人草、珊瑚、玳瑁、海螺等。早在晋代就有中国渔民在该岛捕鱼和捞取珊瑚的记载^②。1935年,国民政府海军部东沙气象台台长方均等人曾在这里发现凝结在珊瑚沙石块上的中国古钱,其中有唐代以前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通宝”,宋代的“景祐元宝”、“皇宋通宝”、“圣宋元宝”、“大宋元宝”,元代的“至正通宝”,明代的“洪武通宝”、“永乐通宝”,清代的“雍正通宝”、“嘉庆通宝”和“光绪通宝”等^③。1909年,经营东沙岛一带渔业的商人梁应元也禀称:“历来渔船,来往广东惠州属岛之东沙地方,捕鱼为业,已阅数百年”^④,这一切说明,中国人民从很早的古代起,世世代代都在这里从事各种生产活动。

到了清代,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是中国南海渔业要区,“沿岸渔船及闽粤渔户到此捕鱼,每年匀计,不下数百艘”。此外尚有半捕渔半捞海之小船,不计其数。每年获利,大船自数百金至数千金或数万金不等,“沿海著名富户,若陈德利、蔡有三、蔡桂生、冯东秀、赖奇头等,积资或数十万或数百万,皆自该岛起家者也”^⑤。广东福建渔民为了祈求海上平安,在岛上建有海神庙。有的记载称该庙为天后庙或大王庙,天后指的是妈祖,大王指金龙大王之类,也就是说该庙内供奉妈祖和大王神。这大王庙建于何时,已无法考定,据清末广东香山县人梁胜称:“小的从前自同治八年(1869年)在同安祥大渔船雇工,前往东沙岛捕鱼为活,……初到岛上,见树木林深,并由小的经手种有椰树三株。又见有大王庙一间,系旧的。小的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签银二千元左右修好”^⑥。梁胜于1869年初次到东沙,见到该庙是旧的,可见此庙已历有年所。该庙坐西北,向东南,“庙之旁,屯有粮草伙食等物,以备船只到此之所需”^⑦。

中国渔民在开发经营东沙岛的过程中,曾付出巨大的代价,有不少渔民死于岛上,并安葬于此。所以,在东沙岛有许多中国渔人的坟墓。仅同安祥和广安祥渔船渔民,“自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止,共死各伴一百三十二人,均在岛上安葬,其死之姓名年月,用簿注明”^⑧。为了祀奉死去的渔民,在东沙岛上还有中国渔民建立的“兄弟所”一间。“兄弟所”亦称“先友兄弟所”,也就是祠堂。

中国渔民每年往东沙群岛捕鱼3次,正月去,四月回,为第1次;五月至八月为第2次;九月至十二月为第3次。他们乘大渔船出海,到达东沙群岛后,“每日分伴开舢板在东沙岛洋面左右捕鱼,所取皆大鱼及师腌肉,装回船上腌臢”。在洋面上取得胶菜,则在东

① 李长傅:《东沙岛和西沙群岛》,《地学杂志》,卷13,8、9期。

② 晋裴渊:《广州记》,见《太平寰宇记》,卷156,岭南道一:“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

③ 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页100~101。

④ 《张督致胡大臣函》,《东沙岛成案汇编》,页22。

⑤ 《地学杂志》,宣统二年第3号,《大东沙岛》。

⑥ 《梁胜等供词》,《东沙岛成案汇编》,页65~66。

⑦ 《渔商梁应元禀词》,《东沙岛成案汇编》,页16~17。

⑧ 《船主梁胜等供》,《东沙岛成案汇编》,页66。

沙岛上木棚上晒干,捕得玳瑁,剥去鳞壳,也将肉在木棚上晒干。这是很早以来就有的传统方法。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广安祥渔船股东又在东沙岛上“重新建造晒胶菜木寮一间”。这木寮也称木厂或木棚,“由澳门成泰木厂承建,连工包料,共用去银四千多元”^①。木寮长28丈,阔4丈8尺。广安祥渔船每次出海,“约取鱼七百零担,每担约值银七两之谱。胶菜七百担,每担约值银七两零之谱。师醃肉二十担,每担约值银四十零两。玳瑁鳞三担,每担好花值银一千六百元,次些每担约值银千一二百元之谱。晒乾玳瑁肉一担值银约四十两。每一次约四个月,得货银约二万元左右。俱驶回澳门发卖,或中途卖与小料船”^②。由于东沙群岛海域水产丰富,到东沙捕鱼是件有大利可图的营生,所以广东有谚语云:“要发财,趁东沙”^③。

二

西泽吉次是一位富有冒险精神和殖民野心的日本商人,在台湾基隆、神户、长崎、东京都有他开设的商店,店名俱称“西泽商店”^④。他本来并不知道有东沙岛的存在。他知道有这么一个海岛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1901年,西泽在日本订造双桅帆船1艘,言明在台湾基隆交货,这年夏间,该船由日本起航,因船主不明风涛,误驶至琉球岛之南鸭依鸭口岛。由该岛开行后,又遇飓风,飘至一个他们不知其名称的小岛,停泊两日,船主与水手登岸,取了岛沙回船。船抵基隆时,西泽见这岛沙不同于寻常,便将它拿去化验,结果证明该沙含有磷质。西泽对此大感兴趣,向船主询问该岛位于何处。因船上既无罗经,又无其他测量器具,所以船主未能指明该岛的位置和方向。由于他们不知道此岛的名称,所以称之为“无名岛”^⑤。这是西泽初次听到有关东沙岛的情形。

如果说西泽知道有这么一个小岛是出于偶然,那么,他企图占有此岛则是与当时日本向外侵略扩张的历史背景相连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为了扩张领土和开拓殖民地,曾发动两次战争,即1894年的中日战争和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通过这两次战争,它以胜利者的身份,夺取了中国的台湾,迫使俄国割让库页岛南部,并把朝鲜变为其殖民地。这样的历史背景,培育了西泽吉次向外扩张掠夺的野心。所以当他了解到该岛岛沙含有磷质后,便勾起了他的贪婪之心,妄想把它占为己有。1902年,他乘马都鸦双桅船往寻该岛,路经华苏、古都哨、巴泻、伯伦等岛,后抵一岛,据船上水手说,此岛就是前次所到之岛,岛沙即取自此岛。西泽便取了岛沙及海产等,回到基隆,投放市场。这是西泽第一次到达东沙岛和掠夺该岛资源的情形。

为进一步掠夺东沙群岛资源做准备,1903年,西泽派遣化学家再往该岛考察,但因遇到大雾和飓风,船受损害,开往小吕宋修理,旋回基隆,一无所得。

1904年到1906年,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日本市面冷淡异常,船价极昂,运费较前加

① 《代表人周华社供》,《东沙岛成案汇编》,页67。

② 《东沙岛成案汇编》,页65。

③ 《新宁杂志》,第5号(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页42。

④ 调查委员林祥、吴敬荣:《委员报告》,《东沙岛成案汇编》,页14~15。

⑤ 《日领致洋务处苏薛两委员函,附东沙岛经营情形》,见《东沙岛成案汇编》,页51~52。

倍,西泽不得不暂时停止其侵略东沙的行动,但他并没有放弃占有该岛和掠夺该岛资源的野心。

1907年,西泽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便开始大规模地入侵东沙岛。关于此次入侵的情况,他在《东沙岛经营情形》的禀文中写道:“1907年夏间,商购备建屋材料器具,以便运往该岛,于8月6号,携同工人一百二十名,及各种器具材料,乘西古苏轮船前往。11号行抵该岛。但近岸水浅,须用舢板小船及渔船,拨运材料,阅十四日始将各物搬至岸上。……商即乘原轮回基隆,囑令各工人暂立帐篷小屋居住。一面动工开路,平地建屋。九月中,商运粮食回岛,满以为屋宇建成,詎料工人一百二十名有七十人为毒虫咬伤,其余五十人须为调事,以致未能工作。商此次来岛,虽带有建屋材料,但以无人起卸,迫得折回基隆”。“另雇福都轮船,往东京之南一百五十英里之喀治五岛招工,幸招得工人三百八十名,……旋回基隆另购粮食,并聘医生、化学师,以及拨艇等物,于十二月中旬再抵东沙”^①。

在这里,西泽既没有提到东沙岛一带的中国渔民,也没有提到中国渔民在东沙岛上的经营和设施,把这次强占东沙岛的行动,说得和和平平,有如进入无人之境。事实上,西泽强占东沙岛和一切殖民者一样,都凭借火与剑,充满着暴力和残忍。

请看当时在东沙岛一带捕鱼的中国老渔民的诉说吧!

广安祥大渔船船主梁胜诉称:“小的自同治八年(1869年)在同安祥大渔船雇工,前往东沙岛捕鱼为活,是年二十八岁。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旧东物故,由新东主李广星等八人,纠本买大渔船一只,改名广安祥,另置舢板四只,蒙东家开小的红股一份,充当船主之职,每年往东沙岛三次。船内伙伴四十余人,……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左右,有大兵轮一艘,载有日本人约二百余,俱西装服色,有无土人,难以分辨,车至(即开至之意)小的大渔船,走过船来,有携剑者,有携刀枪者,要赶小的等,不准在此岛左右捕鱼,即刻要小的开行。小的等不允,遂将舢板四只打烂,木料浮于海面。此三四日间,又见兵轮日人登岛,将大王庙、兄弟所尽行毁拆,用火焚化。又见岛上有坟墓百余座用铁器掘开,取出各骸骨,将胶菜木棚尽拆,又砍伐岛上树木堆起,将百多具尸骨,架着火棚,尽行烧化,推入水中”^②。

当时与广安祥大渔船同在东沙岛捕鱼的还有新泗和大渔船,该船载重1500担,有船伙23人,“船主名梁带,渠在东沙近四十年,向在该处捕鱼”^③,他控诉说:“我新泗和渔船,历年往来东沙,捕鱼为生,……光绪三十三年,日本人到东沙,将大王庙一间撤了,并有许多伙食在内,此伙食,乃系饥寒所用。又撤了我新泗和鱼板六只,洋板二只。于宣统元年正月初十日,复往东沙,不料日本人二月十九到我大船,斥逐我船离岛”^④。

再看渔商梁应元的禀词:“禀为日人凌逼,骤失常业,恳恩切实设法,借资保护事。窃商……历年均有渔船来往广东惠州属岛之东沙地方,捕渔为业,于光绪三十三年,忽有日人多数到岛,将大王庙一间拆毁。……现在日人公然在此开挖一池,专养玳瑁。前时该庙之

① 《东沙岛成案汇编》,页52~53。

② 《梁胜等供词》,页65~66。

③ 飞鹰号《船主报告》,《东沙岛成案汇编》,页18。

④ 《委员报告》,《东沙岛成案汇编》,页16。

旁,屯有粮草伙食等物,以备船只到此之所需,今已荡然无存。又撤去本号新泗和带记鱼船之附属鱼板六只,计每只长二丈,阔三尺,值价银五十元;洋板二只,每只长一丈八尺,阔五尺,值银二百元”^①。

日本人强占东沙岛之后,便在岛南建小码头一座,全用废木烂板架成。为了岛上运输方便,建设了一条小铁路,由北而南,直至码头。此外,还在岛上安设电话、吸水管,建立制淡水厂,挖池积蓄雨水,建筑日本式房屋和办公所,悬挂日本旗,准备把该岛据为己有。为此,他们除了毁灭岛上的中国庙宇、坟墓和其他一切建筑物外,还在岛上立一木牌,南面写“明治四十年八月”,北面写“西泽岛”字样^②。并把东沙礁改为“西泽礁”^③。西泽把我国东沙岛改名为西泽岛,把东沙礁改为西泽礁,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要把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开发经营的东沙群岛,说成是他西泽吉次首次发现和命名的,以便把它据为己有。当时中国官员已看出西泽的险恶用心,指出他“易东沙为西泽,以为影射也”^④。

西泽对东沙群岛资源的掠夺,以采掘磷质为主,以采取海产为辅。此种磷质是由千百年来鸟粪和其它物质堆积而成,有的已成为鸟粪磷酸矿。此种鸟粪层,东沙岛到处皆是,厚约3尺至6尺不等,经过处理,可以作为肥料,质佳价昂,所以西泽在东沙岛着重开采该岛的磷质鸟粪。此外则掠夺东沙岛的海产资源大海龟、玳瑁、螺壳等。西泽供称,一日可得大龟50个,“龟肉可做药品,日本东北方甚为需用,于是在该岛制造,并请化学名师提取精汁”。“玳瑁原由南洋运往日本,制造钮扣,而大坂商人专购该岛玳瑁,而肉亦作食品”。对于东沙群岛一带所产的胶菜,西泽也雇人开采。他说:“该处青苔,可制成鱼胶,日本销场甚广”。这里所说的“青苔”,指的是一种名叫麒麟菜或石花菜的海藻,此种海藻,含胶量高,所以也称“胶菜”,是提炼琼脂的好原料,在访识、食品、医药等工业部门,有广泛的用途。此外,西泽还雇人采取螺壳、鸟毛等。为了把在东沙掠夺到的资源运回,西泽派遣福都号、大门第三号、大门第五号、马奴号等轮船,轮番前往东沙岛,每半月一次,往往满载而归^⑤。

三

西泽驱逐中国渔船,强占东沙群岛,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全国报刊纷纷发表消息、文章和评论,谴责西泽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迫害中国渔民的行径。中国渔民也没有被西泽的残暴所吓倒。新泗和带记渔船仍然坚持到东沙岛捕鱼,虽然“日人复来干涉,斥逐该船离岛”,但新泗和渔船从船主到渔民,都不为所动。正如船东渔商梁应元所说:“商因念此岛,向隶我国版图,渔民等均历代在此捕鱼为业,安常习故,数百余年。今日反客为主,商等骤失常业,血本无归,固难隐忍,而海权失落,国体攸关,以故未肯轻易离去”^⑥。渔商和渔民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来这里调查日人侵占东沙岛情形的广东官员们的赞扬和支持。

① 《委员报告》,页13。

② 同上。

③ [日]柴山武德著:《海南岛》(昭和十七年三月日本拓殖协会出版),页163,《东沙群岛》。

④ 《委员报告》,页13。

⑤ 《东沙岛成案汇编》,页54~55。

⑥ 《渔商梁应元禀词》,《东沙岛成案汇编》,页16~17。

官员们给渔民一面旗帜,并嘱咐他们坚持在这里捕鱼,不要理采日人的无理要求。渔民们深受鼓舞,立即将旗帜悬挂在船上,决心与入侵者斗争到底^①。

在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中,第一个起来反对日本侵占东沙群岛、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是两江总督端方,当他获悉日本商人西泽吉次侵占中国南方沿海岛屿的消息后,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底便向清政府外务部报告说:“访闻港澳附近,‘有中国管辖之荒岛一区’,‘近被台湾基隆日本商西泽吉次,纠合百二十人,于六月三十日午后,乘四国丸轮船驶向该岛,七月初三日登岸,建筑密舍,竖立七十尺长竿,高悬日旗,并竖十五尺响标,详记发现该岛的历史,名为西泽岛。暗礁,名为西泽礁。西泽遂据为己有。该岛磷矿极多,树木亦复茂盛,有高四五十尺者。鳞介贝壳甚夥,网采颇易,温度与台湾相彷彿。西泽已采取水陆各种,装运至台。现在第二次运船将到,凡闽粤人之老于航海者及深明舆地学者,皆知该岛为我属地’”^②。希望外务部迅速查办此事。外务部立即致电两广总督张人骏,请他调查是否确有其事。由于端方报告中没有该岛的中国名称,所以张人骏派人遍查图籍毫无所得。就在这时,端方已查出该岛的英文名称和位置。他在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致两广总督张人骏的电文中说:“现据驻宁日领谈及,(该岛)实在台湾之西南,香港之东南,距香港一百七十余英海里,并举其经纬度及英名名称。按其所言考之,即系前准贵省咨送广雅书局所印《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说》内之蒲拉他士岛,一名蒲勒他士岛,为广东杂澳第十三,在北纬二十度四十二分,东经百十六度四十三分,距香港一百七十英海里。长一英海里半,阔半英海里,高四十英尺,沙质无泥,其形似马蹄,靠西边,有一港口,约半海里深,上十年中国渔船在此港避风,确系广东所辖。上年两江派员所绘海图,亦有此岛。英海部所刻海图,亦有此岛”。“确是中国之地,不可置之不问”^③。

清政府中另一位关心日人侵占东沙岛的封疆大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两广总督张人骏。他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起即与两江总督端方电报往来,探讨处理这一事件的办法。他和端方都认为,应先派遣军舰前往调查日人侵占的确实情形,然后再向日交涉。光绪三十四年九月,端方采纳张人骏的建议,致电海军水师提督萨镇冰,希望他从南洋舰队中,酌派1舰,“前往细查确勘”^④。由于南洋舰队当时正在接待美舰,未能抽拨,直到宣统元年正月,才派飞鹰号兵舰前往调查。飞鹰舰于十一日晚由香港开行,十二日到达该岛,查明了“蒲拉他士岛,即土名之东沙,日人改名为西泽岛”。岛上日本男女原有400余人,现在仅有百余人,盖屋居住。并雇有小工50余名。“在此寻觅沙鱼、龟鱼,并礁上之雀粪,用作田料,质佳价昂,日人视为大宗权利。该处已设小铁路、德律风、并木码头、小火轮、小舢板等件,以便起运各物。中国渔民前建之天后庙,日人来时,已被毁去,以图灭迹。间有渔船到此,日均驱逐离岛”^⑤。就在这时,张人骏也已查明潮州汕头口东南海面,相距约五百华里,有东沙一岛,向为闽粤各港渔船捕鱼聚集之处,并经渔户鸠资建立天后庙,随时寄顿公

① 嘉尔生:《航主报告》,《东沙岛成案汇编》,页18。

② 《外部致张督电》,《东沙岛成案汇编》,页2。

③ 《端督致张督艳电》,《东沙岛成案汇编》,页5~6。

④ 《端督致萨提威电》,《东沙岛成案汇编》,页8。

⑤ 飞鹰舰《黄管带报单》,《东沙岛成案汇编》,页9。

粮,为避风之用。此岛英国海军部海图名曰蒲拉他士岛,“在我国向名东沙,沿海渔民,皆能道之”^①。张人骏还把搜集到的英国海军绘制的中国海总图、蒲拉他士岛专图暨《中国江海险要图志》,以及岛上日人布置各处的影片8页,呈送外务部。同时他还与端方联名致电外交部,说日人侵占的东沙岛,“确归粤辖,沿海居民,类能言之,且有图志可据,现经派舰实地查勘,该日商已在该岛修盖房屋,并已建设铁路、电话、码头等项,是其私占有据,若不设法争回,则各国必援均沾之例,争思攘占,所关非细,拟请钧部迅与日使交涉,飭将该国商民一律撤回,由我派员收管,另筹布置,以申主权”^②。同时,为了更进一步弄清日人侵占东沙岛的情况,张人骏又派飞鹰号军舰和海关巡舰再次前往调查。这次调查比前次更加深入,并见到当时尚坚持在东沙捕鱼的中国渔船,听取了船上渔民对日本侵占东沙驱逐中国渔船,毁灭岛上中国一切设施和庙宇等暴行的控诉,同时还同西泽吉次在岛之上事务人浅沼彦之丞进行问答。浅沼彦之丞说他们是受西泽吉次之委任到此经商,西泽吉次在台湾、东京等地均有商店,此处是西泽商店的办事处,系个人生意,亦未知日本政府曾否与闻,惟去年夏间日本台湾总督府曾派官吏6名至此视察,亦不知此岛属于何国^③。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十三日,张人骏致电外务部,说已查明“该岛日人,祇系经商私往,日本政府或未闻知,其驱逐渔船,已据渔民具控有案”,“该日商西泽频年所为,殊属不合,自须商令撤回,应否由钧部与日使交涉,或先由粤向日领询问,俟复答后,再作计较”^④。外务部复电主张先由两广总督与日本领事交涉^⑤。于是向日本政府交涉从东沙岛撤回日人的任务,就落在张人骏的肩上了。

四

中日关于西泽强占东沙群岛的交涉是从宣统元年(1909年)春开始的。这年夏历二月二十六日,张人骏就日人侵占东沙岛一事照会日本驻广州领事赖川浅之进。照会说:“现查惠州海面,有东沙一岛,向为闽粤各港渔民前往捕鱼时聚泊所在,系属广东之地,近有贵国商人,在该处雇工采鳞,擅自经营,系属不合,应请贵领事官谕令该商即行撤退,查明办理,以弭睦谊”^⑥。二月二十七日,日本领事来两广总督衙署面称,他对于此事毫无所闻,已电日本外务省。二月三十日,日本领事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指示,再次来到两广总督衙署,“谓该岛原不属日,彼政府亦无占领之意。惟当认为无主荒岛,倘中国认该岛为辖境,须有地方志书及该岛应归何官何营管辖确据,以便将此证据电外交部办理”。同时还狡辩说:“至西泽经营该岛,本系商人合理营业,已费甚巨,日政府亦曾预闻,应有保护之责”^⑦。在

① 《张督致外部函》,《东沙岛成案汇编》,页10。

② 《端、张两督会致外部密电》,《东沙岛成案汇编》,页11。

③ 《委员报告》,页15。

④ 《粤督张人骏致外部查明日商私据东沙岛请与日使交涉电》,《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页6~

7。

⑤ 《外部复张人骏东沙事请询日领俟其答复再办电》,《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页7。

⑥ 《张督照会日领文》,《东沙岛成案汇编》,页20。

⑦ 宣统元年二月三十日《粤督张人骏致外部,日领谓东沙原不属日应否与日廷交涉候夺电》,《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页39。

这里,日本领事主要声明两点:其一,认为东沙岛为无主荒岛,其二,因为此岛为无主荒境,所以西泽在此经营是合理营业,日本政府负有保护之责。张人骏立即给以驳斥,他说:“东沙系粤辖境,闽粤渔船前往捕鱼停泊历有年所,岛内建有海神庙一座,为渔民屯粮聚集之处,西泽到后将庙拆毁,基石虽被挪移,而挪去石块及庙宇原地尚可指出,该岛属粤辖此为最确证据,岂能谓为无主荒境”^①。接着,日本领事照复两广总督张人骏称:“倘清国有该岛实属清国之确证,则日本政府必当承认其领土权”^②。同时,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在中国驻日使馆晚餐时,也向中国驻日使臣胡惟德说:“现在中国如有确实凭证,自当认为中国领土。此岛日人,应由中国保护。尚无确证,足见此岛本无所属”^③。张人骏对日本政府置千百年来中国渔民经营东沙群岛的事实于不顾十分气愤,他说:“夫日商西泽,不过以个人营业,其情只等于我粤渔民前往建庙屯粮之举。岂该岛先已发见于我华人者不足据,数百十年后一日本商人以无理侵夺,驱华民而据之,彼政府未前知,彼领事未前知,转可认为发现该岛之哥伦布,欲取我国归辖之境,列之无属荒区乎”^④。

至于证明东沙岛为中国所属的图籍,这时张人骏已搜集到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陈寿彭译的《中国江海险要图志》,以及中国和英国出版的一些地图。《国朝柔远记》载有光绪七年六月(1881年7月)王之春绘制的《沿海舆图》,此图在广东潮州府惠来县之南海中,绘有“东沙”岛^⑤。《中国江海险要图志》,系译自英国海军部1894年出版的《中国海指南》(China Sea Directory)。该书所录“皆系英国水师诸船,由1845年至1894年测量实在险要形势,又复采辑英水师各兵船及领事人员至于涉猎其滨海之商人游客记载口说,亦节以1894年为止”^⑥。书中记载说:蒲拉他士岛(即东沙岛),其东北尽处在纬线赤道北二十度四十二分三秒,经线由英起算偏东一百十六度四十三分十四秒。“岛内有浅滩及澳,透入其西向半迷当,足供中国渔人以避风,中国至此围渔,已有年所”^⑦。并说1858年4月英国曾探测过该岛。书中第三图《广州一:广东省由琼州至南澳图》,在汕头港口正南海中,绘有“蒲拉他士”。第四十一图是“蒲拉他士岛”专图,标题是《广东杂澳十三蒲拉他士岛》,图上并标有“华船泊处”^⑧。其他中英地图也可与上述图籍相印证。由于张人骏已掌握这些证据,所以他致电外务部说:“海图及舆地各书,列有此岛,均指粤辖,证据已足。西泽擅向经营,毁庙驱船种种不合,实系日人侵夺”^⑨。他请外务部电令驻日使臣胡惟德与日本外务省交涉,飭令西泽撤出东沙岛,并赔偿毁灭庙宇、驱逐中国渔船和私运燐质出境等所造成的

① 宣统元年二月三十日《粤督张人骏致外部,日领谓东沙原不属日应否与日廷交涉候夺电》,《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页39。

② 《日领照复张督文》,《东沙岛成案汇编》,页24。

③ 《胡大臣致张督冬电》,《东沙岛成案汇编》,页24。

④ 《张督致外部函》,《东沙岛成案汇编》,页27~28。

⑤ 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20,页22,《沿海舆图》。

⑥ 陈寿彭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卷1,页5,原卷首,原叙。

⑦ 《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卷10,页1~2。

⑧ 《中国江海险要志图》,卷1。

⑨ 宣统元年二月三十日《粤督张人骏致外部,日人侵夺东沙证据已足,拟商令西泽赔偿损失电》,《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页44。

各项损失^①。清外务部采纳了张人骏的意见,电知胡惟德,请他酌核与日本政府外务省提议。

宣统元年闰二月八日,日本领事到两广总督衙门与张人骏晤谈东沙岛事。张人骏便将《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和《国朝柔远记》等记载东沙岛属于中国的图籍拿给日本领事阅读。在这些证据面前,日本领事透露了日本政府有意承认东沙群岛属于中国的消息,但有附加条件,他说:“以该岛属于中国的证据,虽未齐备,重以粤督之言,似亦未偿不可承认,惟须妥为保护,否则恐政府仍作无主之岛看等”^②。张人骏询问他所说的“保护”是什么意思。日领说:“西泽经营,颇费工本,一旦撤退,必多损失,亦殊可悯。……撤退后,其所营房屋机件铁路等物,必有相当之办法”^③。张人骏诘以我国渔业,无端被逐,伤损甚巨,应作何办法?对此,日本领事并无切实之回答。通过这次会晤,张人骏明白了日本政府的意图,觉得颇可就此转圜。所以他致电外务部,请示是否可以电知驻日使臣胡惟德,此案先由广东总督与日本领事磋商,暂缓向日本外务省商办。外务部同意了张人骏的意见。闰二月十七日(1909年4月6日),日使复照外务部称:日本政府已将解决东沙问题的办法通知了日本驻广州领事,但请清政府留意,“西泽到该岛创始营业,全系善意,此事结局,纵定为中国领地,而对该商平善事业,应加相当之保护”^④。接着日本领事提出了解决条款,主要内容是:西泽经营东沙岛费资51万元,该岛归中国后,西泽可以停止采海产和开牧场的计划,但应让西泽继续留在岛上开采磷矿鸟粪,期限30年。很明显,日方的要求“意在久假不归”,张人骏当然不能同意。他提出了四条解决办法:一、先将东沙岛交还中国;二、西泽在岛上的一切设备,由两国派员公平估值,由中国收买;三、岛上庙宇被毁及沿海渔民被驱逐历年所造成的损失,亦由两国委员详细公平估值,由西泽赔偿;四、西泽所采岛产、海产,应加一倍向中国补纳正半各税。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日本领事面见广东洋务处道员魏瀚,提交一份草单,以交还该岛非中国收买西泽该岛物业之价额确定不能办理,同时矢口否认西泽曾驱逐中国渔民和毁灭中国庙宇,并认为西泽经营该岛,已费巨资,损失太大,实不能纳税。此后,经张人骏与之反复磋磨,日本政府自觉理亏,况且当时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向中国东北扩张,不值得为西泽之事与中国多费口舌,所以基本上接受了张人骏提出的解决东沙岛问题的办法。四月二十四日(6月11日),日本领事照会两广总督称:日本政府的意见是:两国派员到岛,第一对西泽在岛上的设施进行估价,第二调查庙宇存在之事,渔户被西泽驱逐之事,拟出西泽赔偿之额。第三出口税一事,由收买价额内,割一小额,以出口税名义支出^⑤。清政府对日方提出的建议表示赞同,于是张人骏派委洋务处道员魏瀚为代表,日方派驻广州领事为代表,于六月初一日(7月17日)一同前往东沙岛勘估。经过多次会谈,再三辩论,直至八月十六日,双方才取得一致意见,拟定了条款,主要内容是:中国收买西泽

① 宣统元年二月三十日《粤督张人骏致外部,日人侵夺东沙证据已足,拟商令西泽赔偿损失电》,《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页44。

② 《张督致外部齐电》,页28~29。

③ 《张督致外部齐电》,《东沙岛成案汇编》,页28。

④ 《外部致张人骏东沙岛事如商有了结办法希电复电》,《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3,页4~5。

⑤ 《日领照会张督文》,《东沙岛成案汇编》,页34。

在东沙岛上之物业定为广东毫银 16 万元;西泽交回渔船、庙宇、税项等款,定为广东毫银 3 万元。八月二十八日(10 月 11 日),两广总督袁树勋与日本驻广州领事瀨川浅之进在条款上签字盖印。

十月初七日,清方代表补用知府蔡康在东沙岛点收物产,举行接受典礼,由广海兵舰鸣炮 21 响,以申庆贺。日本政府派驻广州副领事掘义贵参加接收仪式。翌日,蔡康与日本副领事乘广海舰回广州,派官兵留岛驻守。中日关于西泽掠夺中国东沙群岛资源的交涉,至此结束。

五

中日关于西泽强占和掠夺东沙群岛及其海域资源的交涉,是衰弱的清国与强横的日本国之间的交涉。国力是外交的后盾,国力的差距决定了清政府在交涉中的不利地位。在这种形势下,清朝两江总督端方、两广总督张人骏以及其他官员,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利益,不畏强暴,抓紧时机,搜集证据,竭尽心力,理直气壮地与日本政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认东沙群岛属于中国的事实,撤出侵占该岛的日人,赔偿中国渔民的损失和向清政府补纳税款。虽然清政府未能没收西泽在该岛的一切设备,而是向他支付收买设备的款项,这是不尽人意的,但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为了收复国土,清朝官员作出这样的妥协是比较现实的,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没有他们坚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斗争,东沙群岛恐怕早已沦为异域。他们在强敌面前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决不能因为他们是晚清时期的封疆大吏而加以抹杀。

西泽强占东沙岛事件虽然结束了,但其掠夺东沙岛鸟粪磷矿和海产资源的活动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东沙群岛的鸟粪磷矿,在西泽吉次之前,似乎还没有被人所重视,西泽开采以后,刺激了一些日本人的贪欲,他们继之而起,采用各种方式,继续掠夺东沙群岛的各种资源,并进一步把侵略的黑手伸向我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掠夺这些岛屿的鸟粪矿藏和海产资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激发了中国人民和政府进一步开发南海诸岛资源的热情。他们吸收了东沙岛被日人强占,资源被掠夺的教训,认为这些天造地设界以中国的丰富资源,如果自己不抓紧开采,必招来外人的掠夺。因此,沿海商人纷纷组织公司,在政府批准之后,从事南海诸岛磷质和水产资源的开发经营。中国政府也采取各种措施,制定各种开采计划,加强对南海诸岛的管理,以抵制外来的侵略。

(吕一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古长城的国防价值再评估

姚有志 毛振发

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力量和智慧的象征,是世界军事筑城史上的伟大奇迹,这一评价,举世公认。但是,关于古长城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影响及其国防价值的评估,多少年来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统而观之,古今研究长城者,颂其功绩者多,陈其弊端者少。纵有从正反两方面考评长城者,也多是站在中原望长城,故很难对其做出深透精到的评估。我们认为,评估长城在军事上的功过是非,应该站在一个较高的立足点上,有一个恢宏宽阔的思维空间,严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也就是说,不仅要站在中原看长城,而且要站在长城之上,甚至要换个位置——站在蒙古草原上看长城,把长城放到一个如何维系中华民族统一与发展的大战略上去考察,才能对长城的历史地位、作用及其国防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价。本文试图从这种新的角度和思维出发,依据近几年学术界对古长城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我们学习中国军事史的最新体会,对古长城的国防价值进行再评估。

一、长城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对保护中原地区农业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城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人为的分水岭,是农业与游牧业两大经济结构相互撞击的产物。自春秋战国之交,我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原地区的各主要诸侯国战争频繁,相互争霸,为守护自己的领地而彼此设防,以楚国为先,宋、齐、魏等国继后,开始在邻近敌国的边境修筑绵亘数百里的长城线。与此同时,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尚处于奴隶制初期阶段的游牧民族,经常深入黄河以北地区,掠夺粮食和人口,严重妨碍了那里人民的正常经济生活。地处华北地区的燕、赵等国为防御游牧民族的南侵,也开始凭山依险,修筑长城,于是出现了持续 2000 多年的长城拱卫线的雏形。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以后,拆毁了中原各诸侯国之间的长城,集中力量修筑横贯北部地区万里长城,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挡北部游牧民族的南侵。

广大中原地区自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相继奉行“耕战”政策,鼓励垦荒耕作,发展种植业,却忽视了畜牧业。这种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促使人们除草毁林,垦拓农田,重视发展耕牛,轻视喂养马匹。因而马匹对于中原广大农业区域来说,一直是稀缺之物。相对封闭的农业经济和缺少马匹的农业文明决定了封建王朝的军事结构。在战争时期,中原封建王朝的军队一般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而北方游牧民族的军队则是戎马集群,来去飘忽,机动灵活。在冷兵器时代,步兵的战斗力和机动性与骑兵相比,自然是相形见绌的。因而,中原步兵军队凡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进行野战,十有八九要败北。如公元前 201 年秋,匈奴冒顿单于率 40 万骑兵越长城侵袭汉边,前锋进至铜鞮(今山西沁县南)。次年,汉高祖

刘邦率步兵 32 万迎击匈奴,结果被冒顿的骑兵围困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历 7 天 7 夜才突围脱险。自此以后,中原王朝凡在国力衰微,缺少强大骑兵的情况下,一般要“以守为长策”,以坚城固堡,深沟高垒为屏障,以遏阻北方游牧民族强大骑兵的袭击。

长城是与封建时代和冷兵器时期的军事特征相适应,应抵御游牧民族的袭扰,保护中原农业文明的需求而逐步发展的。长城依天然的山川之险,盘峰踞水,控扼要冲,墙堡一体,烽墩相望,战时可以驻重兵,阻挡游牧民族骑兵集团的猛烈冲击,平时也可以“乘边墙以防其出没”,并可节省戍边兵力。秦始皇筑长城,曾一度“却匈奴七百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汉武帝筑长城,将匈奴挡在了河西走廊以北地区,也曾有效地保护了通往西域的交通干道;特别是在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曾防守蓟镇,他进一步改造整修长城,使其真正成为坚守防御的“人工屏障”,鞑靼骑兵曾在古北口长城外徘徊两月而不敢进,说明在一定时期,长城确能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效果。

应该指出,长城之所以能起到防御作用,并非仅仅由于那一道巍峨耸立的高墙,也由于历朝历代在构筑长城的同时,还实行了移民实边或戍兵屯田的政策。秦始皇时期,一面命大将蒙恬在北边修筑长城,一面推行移民政策,开发边疆。汉武帝时,随着对匈奴作战的胜利,也不断地徙民到边郡屯垦,调“塞卒、边卒”实行屯田,最远的屯田达到西域的渠犂、轮台(今新疆库尔勒一带)。汉宣帝时,后将军赵充国率军破先零,罢骑兵,以步兵屯田,长期戍守边塞,被后人誉为是巩固边防的“千古之策”。明朝在北部边地设边镇,建卫所,调集几十万大军筑城戍守,同时督令戍兵垦殖耕作,“三分守城,七分屯田”^①,寓兵于农,且耕且守,促进了边境的开发和生产。唯其如此,万里长城才能不仅是作为一堵墙,而是作为一道以一定的经济和兵力资源为基础,以攻防兼备的防御工事为主体,以纵横交错的驿传系统为通信网络的边防军事体系,发挥着保卫中原农业文明的屏障作用。

二、古长城多是各封建王朝国力衰弱的无奈举措, 反映了中原地区封建统治者的消极防御思想

古长城在军事筑城史上代表着辉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回天之力与聪明智慧,但是,从综合国力和军事力量上进行全面考察,长城的建造往往不是代表着强盛,而通常是各封建王朝国力衰弱的无奈举措,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消极防御思想。

认真考察长城的建筑史,我们不难发现,历代的长城大多不是构筑于国富兵强之时,而是兴造于国衰兵弱之际。秦国的国力最强时期,是在秦孝公起用商鞅变法之后至始皇帝嬴政即位初年,时跨 130 多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虽然形成了疆土广阔,华夏一统的大帝国,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兼并六国的战争,到嬴政完成统一大业时,中国已经是满目疮痍,民困兵疲。这里需要指出,无论古代或现代,看一个国家是否强盛,不是以版图大小和人口数量多寡为唯一标准,而要看其综合国力如何。即看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资源等各要素及其数量和质量之总和。其中只要有一个或几个要素羸弱或量与质不能达到完整

^① 《明史》,卷 77,《食货志一·屯田》。

的统一,都要削弱国家综合国力。据此考察,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虽然拓展了国家版图,增加了人口数量,建立了空前的封建大帝国,但是他并没有致力于发展国家经济,使人民休养生息,而是在政治上严酷残暴,经济上横征暴敛,军事上穷兵黩武,致使社会危机四伏,国民经济困难到极点。尽管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却匈奴七百里”、“略取河南地”,但因国势已衰,秦军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贯彻进攻战略,只好退而筑墙防守。显然,筑城防守并不符合秦始皇的“虎视何雄哉”气派和性格,也绝不是秦国强盛的象征。

汉长城开始修筑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此前的30余年间,是西汉鼎盛时期,“九州膏腴”、“沃野千里”、“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汉武帝依仗强盛国力,发展骑兵,培养猛将,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匈奴的战争。经河南、河西和漠北三大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军队,使“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但是此后数年内,大将霍去病、卫青相继病死,而汉武帝仍旧频繁对匈奴用兵,并多次出兵朝鲜、越南和西羌,加之他生活奢费和不断地巡游封禅,使西汉经济衰退,国力急剧下降。至太初年间,面对匈奴的再次内侵,武帝再也无力组织军事反击,只好命人沿五原郡“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备之”^①。不仅对秦时蒙恬所筑的长城进一步加固,同时还向西延长了数千里。

此后从东汉、北魏、北齐至隋、金等朝代,都曾在北方修缮和新筑过长城,其中多与国势的衰危和武功的羸弱有关。

明长城的修筑也是沿袭这个轨迹。在洪武、永乐两朝,国力强盛,“四夷宾服”,军事力量远比蒙古族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明朝虽然也增修居庸关、山海关等重要关隘,但并没有兴筑全线连接的完整的长城防卫体系,主要执行“以威服之”的军事战略,对蒙古军队取攻势战略。明成祖甚至五出漠北,苦战蒙古军队多年,大大削弱了侵略势力,“威武之振,前代罕及”,但是,明成祖的连年对鞑靼作战,使人力物力消耗巨大,把国家推入“内外具疲”的境地,综合国力大为削弱。自明宣宗执政起,“老将宿兵消亡过半,武备渐不如初”;正统年间,土地兼并加剧,赋税和地租剥削严重,大量农民贫困破产,沦为流民,各种形式的抗租斗争不断发生。在政治上,皇帝昏庸,宦官揽权,贪赃枉法,滥杀无辜,一些无耻官吏逢迎权势,夺占良田,朝政日趋混乱和黑暗;在军事上,“正统以后,边备渐弛”,以京师为例,明初京营劲旅不下七、八十万人,到成化后期便不满七、八万人了,而且大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加之“天下无事,民不知兵,而武备尤废,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危”^②。至宪宗继位,面对国家积弊日深,边备日趋紧张,军队战斗力也是孱弱不堪的现实,终于确定了“守为长策”的国防战略。自兵部尚书余子俊始,在英甫川至定边营1200余里的边防线上建筑墩堡,“增卫益兵,拓城置戍”,奠定了修筑边墙的基础。以后到弘治至隆庆年间,更是筑城建堡,“大修边墙”,把它作为防御蒙古骑兵入侵的主要手段。后戚继光防守蓟镇,对京北长城进一步整修改造,将其加工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令世人叫绝的军事屏障。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军事筑垒线大大南移,呈明显的收缩之势。明长城与秦长城相比,南移最远点达500余公里,最近点也有约200公里。这种情况虽有沿京北险要因山就势的意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王朝国势衰微,无力北进的无奈态势。万历初年主持国

① 《盐铁论·本议第一》。

② 马文升:《为修武备以防不虞事疏》,《明经世文编》,卷63。

政的著名政治家张居正,对这种情况的解释颇具见地,他说:“盛世之守在人,季世之守恃险”^①,认为前者是“无形之险”,后者是“有形之险”。在国力强大之盛世,往往政通人和,兵强马壮,战可以摧枯拉朽,守可以镇慑敌人,治可以以德服人,往往不用专恃险阻;而在“季世”国力衰弱时期,则往往政治腐败,兵弱民疲,战无力,治无策,“无形之险既已靡恃”,也只有借助“有形之险”,固守保国。张居正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辅佐的国家正处于衰败之时,于是他重用军事家戚继光为蓟州镇总兵,委以拱卫京师重任,并为其规定了“贼不得入,即为上策。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的防卫原则,所以才有了戚继光放弃传统战法而致力于筑墙戍守的历史景况。

正由于长城大多修筑在国力衰微的年代,也就从主客观上规定了必然贯彻消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消极防御就是专守防御,是一种被动应战的守势战法。长城的修筑,尽管生动体现了古代军事家在军事地理学方面的真知灼见和组织战略防御的谋略才能,但它也从客观上造就了消极防御思想的僵化模式,束缚了将帅们的创造性思维。从客观条件看,在国家衰败时期,若实行进攻战略,组织强大军队对北方民族骑兵作战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是,修筑如此漫长的边墙,将数十万军队撤在万里边境上分兵把口,也难以达到固若金汤的防御目的。长城沿线守军虽多,“各分汛地,不暇援应”,兵力形不成拳头。针对这种守株待兔的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往往将几万乃至十几万骑兵合为一体,对着长城一点进行集群冲击,任何坚固的城堡都极易被突破。而只要突破一点,则“千里之守,皆为虚设”。而且,长城一修筑,就像给守军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放不下,走不开,无法实行机动灵活地运动作战,只能守在箭垛后面被动应敌。正如明嘉靖朝兵部尚书刘焘指陈的那样:“我散而守,彼聚而攻,虽称十万之众,当锋不过三千人。一营失守,则二十二营俱为无用之兵。十里溃防,则二千余里尽为难守之地。地远而兵微,应援而难至。当仓促应变之时,而取救于千里之外。急则人马疲劳而不能行,缓则延推道路而不得用”^②。这位当时的“国防部长”的经验之谈,为我们的论点提供了确凿的证言。在这种“筑墙置戍”的国防战略面前,任何高明的军事家都无法组织远离城墙的军事行动。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防御方面,长城并不比激流、悬崖、河流和山峰更有效。前面提到,曾以运动作战威震倭寇的戚继光,在隆庆元年被调任蓟州总兵以后,竟也一改往日作战风格,大搞边墙建筑,而且搞得比谁都凶。作为一代名将,戚继光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正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指出的那样:“这种营造和防御政策,把兵力分散配备在这样长的防御线上,归根结底仍由当时的供应制度所迫致。假使没有这种情形,而戚继光有选择的自由,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攻势,创造流动性的战术”^③。黄仁宇的见解很有道理,但他只说对了一半。当时的军队供应制度只是造成军事上消极防御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综合国力的衰弱和由此而决择的“守为长策”的国防战略,以及为贯彻此战略而采取的“筑墙置戍”战略方针。

① 引自《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二十八。

② 《刘带川边防议》,《明经世文编》,卷304、305。

③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页191。